

中国历史百科

张婷婷 主编 第二卷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第二卷 张婷婷 主编

中国历史百科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雅克萨之战

公元17世纪，满族崛起于东北，建立清王朝，并入关夺取了对全国的统治权。这时候，世界上早期殖民主义势力正方兴未艾，大肆从事对外扩张，许多国家和民族遭到前所未有的劫掠、奴役和蹂躏。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接踵来到中国的东南沿海，沙皇俄国也窜至中国的北部和东北边疆。清王朝，从它建立全国政权的时候起，就遇到了复杂而棘手的同西方国家的矛盾，面临着中国历代王朝从未经历过的险恶的国际形势。

从明崇祯九年（清太宗崇德元年，1636）起，俄国侵略军开始入侵中国东北边疆，先后占据了黑龙江上游的尼布楚城（今俄罗斯涅尔琴斯克）和雅克萨城（今黑龙江漠河东南）。俄军在尼布楚与雅克萨建筑寨堡，设置工事，勒索贡税，绑架人质，建立殖民农庄，奴役和镇压当地的中国各族居民，并不断向黑龙江下游进行骚扰、扩张。

黑龙江流域是满族的故乡，是清朝的发祥地，王朝统治者自然不能容忍俄军在这里为所欲为，驱逐入侵军、收复失地成了朝廷十分强烈的愿望。康熙皇帝曾说：“朕十三岁亲政之后（康熙帝亲政在康熙六年，1667），即留意于此（指俄国侵占黑龙江流域），细访其土地形胜、道路远近及人物性情。”可见清王朝的统治者早已看出来自沙俄的侵略势力不可低估，一直密切注视着北方边防，抵抗侵略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但是，在入关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正集中全力，争夺对全国政权的控制，不可能用很多力量去顾及黑龙江的防务。直到清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三藩叛乱之后，才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东北，开始作武装驱逐侵略者的各项准备。

清廷奉行的方针是军事斗争、外交谈判和充实边防三者并举。他们在和俄国长期交涉的过程中逐渐懂得，没有强大的武装，不建立巩固的边防，不经过激烈的斗争，是不可能劝说俄军放弃侵略，撤出中国领土的。同时，清朝统治集团也懂得了中、俄两国都是封建大国，不可能用军事力量彼此压服，只有通过谈判，商定两国都可以接受的边界线，才能保障边境的安宁，才能保持长期的和平。所以军事斗争的结果还是要举行谈判，用兵的目的是为了自卫，为了求得比较公正的解决。

康熙皇帝总结了中国军民三十多年来同俄国侵略者进行斗争的经验，制订了周密的计划，进行了细致的准备工作。康熙二十一年（1682），即平定三藩之乱后的第二年，康熙帝在四月到盛京（沈阳）谒陵后，由抚顺、兴京（今辽宁新宾西）、哈达城（今辽宁西丰东），出柳条边，五月到船厂（今吉林市），航行于松花江上，亲自视察边防情况。同年九月，康熙派副都统郎淡、公彭春率领数百人，以捕鹿为名，到雅克萨附近侦察地理形势和水陆交通。郎淡等回到北京后报告说，“攻取罗刹（清朝对俄国人的称呼）甚易，发兵三千足矣”，并建议立即采取行动。康熙没有同意这种单纯从军事上考虑的意见，认为必须作更为充分的准备，先在黑龙江（今黑龙江黑河东南）和呼玛尔（今黑龙江呼玛河口）两地建城驻兵，贮存粮食，修造船只，筹划屯田，开辟驿路，以求战而能胜、胜而能守。

康熙二十二年（1683）夏天，第一批乌喇宁古塔官兵一千人在副都统萨布素率领下到达瑷珲（今黑龙江黑河南）。次年秋，又有乌喇宁古塔官兵及增派的达斡尔官兵一千人，携带家属到黑龙江屯田驻守。这两批军队共有两千人，是守卫边境、对俄作战的主要力量。清军到达瑷珲后，即在黑龙江东岸古城的废墟上建立城堡，城名黑龙江，设将军驻守，萨布素担任第一任黑龙江将军。

清军进驻黑龙江后，在当地人民的配合下，拔除了俄军在黑龙江中下游的许多侵略据点，收复了大片中国领土。但清朝统治集团并不是单纯采取军事手段，每次战斗都先礼后兵，派人进行政治劝说，表明只要俄军停止侵略，就愿意同俄国保持和平。而俄国方面则野心不死，准备顽抗到底。俄国政府将黑龙江地区殖民占领的军事机构作了全盘调整，任命熟悉情况并以精悍骁勇著称的弗拉索夫和托尔布津分别担任尼布楚和雅克萨的督军，增调援兵，贮存粮食物资，构筑工事，加固城防，准备赖在这里，长期盘踞下去。清廷除了用武力驱逐侵略者以外，已没有其他选择了。

康熙二十四年（1685）六月，清军进抵雅克萨，先遣返俄俘费咬多里等三人入城，带去了两件公文，一件是康熙致沙皇的信，一件是清军都统彭春给雅克萨俄军的咨文，要求俄军立即撤离中国领土，对侵略者发出最后警告。

六月二十三日，清军统帅部移至雅克萨城下与俄方对话，但俄军头子托尔布津却出言不逊，故意挑衅。

二十四日，清军列阵，包围雅克萨。

二十五日，有一队俄军从黑龙江上顺流而下，企图冲进雅克萨，被清军拦截，在江面上展开激战，毙伤俄军四十多人。接着，清军又架起大炮，向雅克萨猛烈轰击，城内到处起火，俄军伤亡惨重，心胆俱裂，走投无路。清军多次把劝降信射入城内，投降条件十分宽大，俄军只要撤出雅克萨，保证不再重来，就可以保全性命，并允许俄军带走自己的武器和财物。至此，托尔布津无可奈何，只好竖起了降旗。清军准许七百多名俄国人撤出雅克萨，并把他们送到额尔古讷河口。另有巴什里等四十五名俄军不愿回国，要求留在中国，随清军回到瑷珲。雅克萨据点内还有一百六十多名被俄军扣押为人质的中国索伦族、巴尔虎族人民，全部获得释放。第一次雅克萨战斗以俄军的战败、投降和撤出雅克萨而告终。

托尔布津率领俄军从雅克萨退到尼布楚，但侵略的野心不死，仍想卷土重来。这时，由俄国政府委派的一名普鲁士军官拜顿率领六百名援军抵达尼布楚。同时，他们打听到，清军战胜后已全部撤回了瑷珲，并没有在雅克萨留兵驻守。因此，托尔布津和拜顿立即率领俄军八百多人又重新占领了雅克萨，并全力构筑城堡工事，妄图负隅顽抗。

康熙二十五年（1686）七月，清廷不得不再次出兵，萨布素率清军二千余名进抵雅克萨。先释放了俄俘鄂克索木果，令他带信入城，再一次警告俄军：“你们又偷偷返回，重建城堡，据守其中。还想凌我方渔民猎户……今我大军已兵临城下，绝对不会轻易舍弃。尔等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你们将被逐出，无力卷土重来，结局便是如此。”但俄军自以为兵多粮足，负隅顽抗，频繁出城攻击。而清军士气高昂，又有当地各族群众帮助，屡次挫败出城掠战的俄军。在战斗开始以后的几天内，就打死了一百多个侵略军官兵，俄军头子托尔布津也中炮毙命。

经过长时间的战斗和包围，俄军大多战死、病死，八百多名俄军最后只剩下六十六人，粮食弹药亦消耗殆尽，尼布楚方面也无力派援军来，困守雅克萨的侵略军只能坐以待毙。

十一月，正当雅克萨围城旦夕可下的时候，一批俄国信使从莫斯科星夜奔驰，来到北京，路上历时几达一年之久。原来，俄国政府已知道雅克萨战争的消息，康熙的几封信也先后被人带到莫斯科。俄国政府清楚，中国进行自卫反击的态度非常坚决，因此十分焦急。可是，当时俄国正由彼得一世的姐姐索菲亚公主执政，贵族们争权夺利，统治很不稳定，又在西方连年作战，兵疲财尽，不可能再派大批军队到中国，困守在雅克萨的俄

军眼看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沙俄政府为了缓和远东方面的紧张局势，决定接受清廷的建议，举行边界谈判，并派出了以戈洛文为首的谈判使团。

清朝统治者表现了极大的和平诚意，以礼接待俄国信使。在雅克萨唾手可得的情况下，同意了俄国的请求，停止战斗，解除包围，并实现单方面撤军。第二次雅克萨战斗由于中国方面倡议和平谈判并停火撤军而宣告结束。此后，中俄关系的历史进入了谈判阶段。

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1689年9月7日），中俄双方经过长达三年的艰难曲折的谈判，正式签订了尼布楚条约。

《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中国和俄国签订的第一个条约，正式文本是拉丁文本，由双方代表签字盖章。条约共六条，实质性部分包括中俄东段边界的划分、越界侵略和逃入的处理、中俄往来贸易的规定等。

中俄东段边界的划分是条约中最重要的部分。条约明确规定，以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和额尔古讷河为两国的分界线。又规定，外兴安岭和乌第河之间的地区暂行存放，留待后议。清政府在领土方面作了重大让步，将尼布楚及其以西直至贝加尔湖原属中国的领土让给了俄国，以换取俄军撤出雅克萨。所以条约又规定了俄国在雅克萨和额尔古讷河南岸的据点全部拆毁、迁移。

《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一个平等的条约。双方代表都在各自政府事先指示的范围之内进行谈判交涉，没有也不可能用武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最后达成的协议并没有超出中俄两国政府愿意接受的范围。条约明确划分了中俄两国的东段边界，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是中国的领土。

在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的一段时间内，中俄的东段边界稳定了下来，边境相对比较平静，两国人民之间的和平交往和贸易也有了一定的发展。

乌兰布通之战

清军人关后，建立起全国的中央统治政权，为了集中力量先稳固其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地位，对分布在中国西部、北部广阔边疆地域的漠西蒙古采取了安抚羁縻的政策。漠西蒙古又称厄鲁特蒙古，游牧于天山以北地区，分为和硕特、准噶尔、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四部。四部当中，尤以准噶尔部最为强盛，仗势凌压蚕食其他各部，先后迫使土尔扈特部转牧伏

尔加河流域，和硕特部迁居青海，又出兵征服了杜尔伯特部。17世纪后半叶，在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的统治下，它们发展成一支十分强大的割据势力，控制着天山南北，威胁青海、西藏和漠北蒙古，成为巩固国家统一、实现民族团结的严重阻碍。

康熙二十六年（1687），噶尔丹经过长期准备，率骑兵三万侵入漠北蒙古（喀尔喀）腹地。康熙皇帝闻讯大怒，遣使要噶尔丹退还其所侵占的土地与掠获的人口畜产，并退回自己的辖地。但是，噶尔丹此时已经头脑发胀，根本不把康熙帝的诏书放在眼里。为了进一步扩充实力，噶尔丹还开始与沙皇俄国勾结。当时清廷正在与俄国举行尼布楚条约谈判，要求收复被俄国侵占的中国领土，噶尔丹派密使去见伊尔库茨克总督戈洛文，请求俄军与噶尔丹军队合作。噶尔丹在给戈洛文的信中说，俄国侵略军可以和他并肩作战。噶尔丹甚至丧心病狂地以出卖祖国神圣领土来博取侵略者的青睐，他在对使臣的指示中竟胡说什么“阿尔巴津（即雅克萨）建寨的地方原本是蒙古的，不是博格达汗（指清朝皇帝）的”，而统辖蒙古人和这个地区的是他——博硕克图汗，“倘若沙皇陛下有意在这里建立城堡，博硕克图汗愿意将这个地区让给陛下”。而戈洛文的复信中，则“保证以俄国军队的相应行动支持”，并派人到噶尔丹处，“继续就可能共同出兵一事进行谈判”。

清王朝的统治者对噶尔丹叛乱其实早就有所警惕。当时清廷正忙于在南方平定“三藩”、在东北抗击沙俄侵略者，尚无能力马上解决这一问题，但仍时刻密切注视着西北地区噶尔丹势力的发展。早在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就派人至甘肃一带探听消息，不时回报朝廷。清朝统治集团一直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少数民族之间的纠纷，力求避免使用战争手段。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廷派大臣到准噶尔，抚慰噶尔丹并赏赐物品，要求其服从中央命令，与各部友好相处。当时的噶尔丹羽翼未丰，与沙皇俄国也还没有达成勾结，不敢显露叛乱的形迹，装出一副十分恭顺的样子。噶尔丹双膝跪地领受诏书，并矢志服从清朝中央政府的命令，一再表示“我并无自外于中华皇帝”、“向在中华皇帝道法之中，不敢妄行”。直到他依仗沙皇俄国的支持，悍然入侵漠北蒙古，康熙帝才知道噶尔丹不仅是个不听诏命的边疆逆臣，而且欲勾引外敌背叛祖国，因而决心对其进行讨伐。

发兵前，康熙帝先召见了在京的沙俄使臣，警告沙俄不得支持噶尔丹

叛乱，并趁噶尔丹集中大军于漠北，后方空虚之际，资助逃亡在吐鲁番的噶尔丹的侄儿策妄阿拉布坦西归伊犁，册封其为准噶尔新汗，使噶尔丹在漠北成了如同春秋时期赴会黄池的吴王夫差式的人物。

康熙二十九年（1690）六月，噶尔丹引军两万余，举兵南犯，深入内蒙古的乌珠穆沁。清廷理藩院尚书阿尔尼，正以钦差名义巡视察哈尔北部，他立即集合漠南蒙古各部迎战。两军在乌尔会河打了一仗。噶尔丹先是佯败，沿途抛弃大批牲畜帐幕。蒙古兵们贪利争夺，队伍错乱，噶尔丹趁机返身攻打回来，阿尔尼猝不及防，被他杀得大败，五百多辆大车及全部辎重被噶尔丹悉数掠去。

噶尔丹初战获胜，更加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率军直逼乌兰布通（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南境），距北京只有七百里之遥。京师震动，人心惶惶，老百姓抢购粮食，米价一度升至三两白银一斤。而清廷也急忙调兵遣将，康熙皇帝一面命令阿尔尼严加警戒，等候大军来援，一面采取分进合击的战略，以裕亲王福全（康熙之兄）为抚远大将军，率左翼军出古北口，以恭亲王常宁（康熙之弟）为安北大将军，率右翼军出喜峰口。康熙帝亲自出塞，准备御驾亲征，后因病停驻在波罗和屯（今河北隆化），指挥各路大军进剿。

叛乱军队很快即面临清左、右翼军的夹攻，噶尔丹很是惊慌，不知如何是好。这时，他身边的一位谋士献上一计，使噶尔丹大喜过望。原来乌兰布通依山傍水，谋士建议在山坳水源处建立一座“驼城”，阻挡清军的进攻，拟待后续援军到来后再发动攻势。于是噶尔丹下令将随军所带的万余峰骆驼环列起来卧倒在地，背加箱垛，蒙上湿毡，环成一圈如同栅栏，士兵们则隐藏在垛隙中打冷枪。开始清军对“驼城”束手无策，不知如何下手，后来，康熙帝从北京调来火炮，决定用火炮轰开“驼城”。

八月一日，清军开始向乌兰布通发起进攻，“隔河而阵，以火器为前列，迳攻中坚”。这次战役打得十分激烈，炮声隆隆，声震天地。据当时一个外国传教士记述：这次“大战以大炮火枪互轰开始，继而两军士卒肉搏”，双方展开了殊死的战斗。在清军的英勇进攻下，噶尔丹的“驼城”终于被攻破，由于骆驼的脚都被拴在了一起，清军专门派出一个小分队，搬开死去的骆驼，打开缺口，大军乘势进击，大败叛军。噶尔丹军力不支，趁夜黑向北逃遁。清军的伤亡也很惨重，康熙帝的舅舅佟国纲中枪身亡。狡诈的噶尔丹兵败后，施用缓兵之计，曾派人向裕亲王福全谢罪，发

誓不再侵犯东土，永为清朝边疆守臣。福全奏报康熙帝，康熙未予理睬，命令继续追击。但作为清军前线统帅的福全，在惧战、妥协的思想指导下，未能乘胜追剿，致使噶尔丹逃走。噶尔丹军北渡西辽河后，疾奔大兴安岭，过大漠西遁而去。

噶尔丹自乌兰布通败归科布多（今蒙古国科布多省），元气大伤，西攻其侄策妄阿拉布坦未胜，北联沙俄亦遭拒绝，只好遣使南至归化，再次向清廷入贡请降。康熙帝召噶尔丹来京，噶尔丹不敢前往，亦不再与清廷联系，而以科布多为根据地，招集流亡，休养生息。康熙帝知道噶尔丹并非真心归降，为了进一步平定噶尔丹叛乱，巩固中国北部边防，他一面组织在木兰行围习武，秣马厉兵，教营伍，练攻战，激励将士，赏罚分明，以提高士气和战斗力，一面对散漫无纪的漠南、漠北蒙古各部进行整顿。

乌兰布通一战之后，康熙帝亲自与内外蒙古各部首领于多伦诺尔（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会盟，联合各部力量，以进一步统一漠北地区。多伦诺尔地势平旷，饶有水草，向来是“内外札萨克来朝者，道里适中”之所。康熙三十年（1691）四月，康熙皇帝自北京出发，亲率上三旗官兵，出古北口，溯滦河而上；下五旗官兵出独石口，会师于多伦诺尔。参加会盟的清军布营设哨，军容威武，气势雄壮。内外蒙古各部首领早已在会盟之地百里以外，听候传谕。康熙帝首先调解了各部之间的宿怨和纠纷。在调解了他们的纷争之后，首领们被逐次引进御帐，朝见大清皇帝，共进御宴，奏乐进茶，在隆重和睦的气氛中，举行了会盟大典。会上，康熙帝郑重宣布：保留各部首领的汗号，取消蒙古贵族原来的济农、诺颜的名号，按满洲贵族的封号，各赐以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等爵位。其军事行政体系也如满洲八旗一样，实行旗兵制，旗下设参领、佐领，从而结束了蒙古各部长期以来没有法度、不能约束、以强凌弱、自相劫夺的混乱局面，加强和巩固了中央对大漠各部的管辖。

多伦诺尔会盟对于加强中国统一，巩固北部边防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进一步发展了清王朝中央与内外蒙古的关系。正如康熙帝所说：“昔秦兴土石之功，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即蒙古），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巩固。”

乌兰布通之战与多伦诺尔会盟以后，清军和噶尔丹又在昭莫多（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东南）打了一仗，此战基本上消灭了叛军的主要力量。不久，众叛亲离的噶尔丹，因精锐丧尽，妻死子虏，走投无路，只好服毒自

杀。清王朝在康熙帝三次亲征后，终于取得了平叛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和北部边防的巩固。

大小金川之战

大金川为今四川省大渡河上游，小金川乃大金川东部的一条支流，因沿河诸山谷的金矿而得名。金川地区为藏族聚居之地，形势险峻，交通梗阻，居民都住在石碉之中。

清雍正元年（1723），大金川演化禅师嘉勒巴之孙莎罗奔因随岳钟琪进藏平乱有功，被授为金川安抚使。莎罗奔势力日益强盛，欲吞并小金川。他先以女儿阿扣嫁给小金川土司泽旺为妻，泽旺性懦弱，受制于妻。乾隆十一年（1746），莎罗奔将小金川土司泽旺劫持，并夺其印信。四川总督下令申斥后，“始还泽旺于故地”。乾隆十二年（1747），莎罗奔发动叛乱，出兵攻掠革什布扎及明正两土司。四川巡抚派兵弹压，反为所败，于是奏请朝廷进剿大金川。乾隆皇帝早就对莎罗奔感到恼火，又鉴于南明余党常在大小金川活动，更加重视这里的形势，立即将平定苗瑶有功的云贵总督张广泗调往四川，相机剿治。

大金川本是天险，西面临河，东边则是崇山峻岭。莎罗奔居住在勒乌围（今四川金川东），命其侄儿郎卡居噶尔崖（金川东南），二城皆在大金川东岸，阻山临水，地势险要，附近筑有许多坚固的战堡。这战堡是土人用石头筑垒而成，高约三四丈，仿佛塔形，里面用人守住，四面开窗，可放矢石，极难攻取。张广泗为求必胜，向朝廷奏请精兵三万人，拟分两路进攻，后因山道艰险，进军困难，又请增兵一万人。然而直至次年春天，清军非但没有奏捷，还连损几员大将。

乾隆帝没想到大金川不过弹丸之地，兴动四万大军进攻数月竟会如此，遂派大学士讷亲为经略，与岳钟琪、傅尔丹等宿将赶赴前线。可是讷亲位高气盛，一至前线即要求从速破敌，限三日务取噶尔崖。结果由于清军准备仓促，大败而归。讷亲不敢再自专，仍依张广泗、岳钟琪之计行事，然而为时已晚。这时，岳钟琪也觉察到为清军担任向导的泽旺之弟良尔吉乃是莎罗奔的耳目，提醒张广泗留意，张广泗听信混入其帐下的南明余党王秋的话，对良尔吉坚信不疑，此后数月，清军仍未得寸进，反倒每战皆败。乾隆帝震怒，认为张广泗有挟师观望之罪，将其斩首。接着，讷

亲亦因滥用职权、贻误战机之罪赐死，乾隆帝改派大学士傅恒继为经略。

傅恒至大金川，立即杀死良尔吉和王秋，断敌内应，同时增调邻省兵马进剿。至乾隆十四年（1749）春天，傅恒始知进剿大金川的确不易，向朝廷如实报告两年来的作战情况，决心不再争夺敌战堡，只等大军齐集捣敌巢穴。这时，乾隆帝已无意再对大金川用兵，以“息武宁边”为名，下诏撤军。不料诏书未到，傅恒与岳钟琪已兵分两路大举深入，莎罗奔因连年抵御，部众亦死伤不少，力不能支，遂释归泽旺，遣使向岳钟琪乞降。岳钟琪因莎罗奔曾是其征西藏时的宿将，今见莎罗奔畏死乞降，仅带数名随从前往勒乌围受降。莎罗奔得知岳钟琪亲至，率领部众出寨恭迎，头顶佛经跪拜马前，然后随岳钟琪赴清军大营去见傅恒。傅恒命其发誓不再抗命，归还侵夺各邻近土司的辖地，献出为其出谋划策的南明余党，上缴军械，然后宣诏赦其死罪，仍为土司。

十数年之后，郎卡代替莎罗奔掌管大金川，始终以曾经重挫清军而自豪，见清廷一再以抚绥边远地区为宗旨，视为软弱可欺，又复桀骜不驯，侵扰邻境，不受四川总督的命令。乾隆帝命川督阿尔泰征调九土司之兵，围攻郎卡。九土司中，兵力较强盛者为小金川土司和绰斯甲（今四川道孚北）土司，其余皆弱小不堪。郎卡于是施展计谋，与绰斯甲土司“结姻”，又以其女嫁给小金川泽旺之子僧格桑为妻，这样便使“有夙怨，不甚联络”的大小金川，反而因“姻党联结”互相联合起来。不久，郎卡死去，小金川土司泽旺也已年老，郎卡之子索诺木与泽旺之子僧格桑各继为土司，大小金川终于结成军事同盟。乾隆三十六年（1771），索诺木诱杀革什布扎土司，僧格桑亦屡次攻打沃日土司，阿尔泰派兵救援，僧格桑竟公然与清军开战。

乾隆帝闻报，想到以前大金川之役本以救援小金川为起因，如今小金川亦敢叛逆，决心予以严惩，立派大学士温福、侍郎桂林赴四川进剿。小金川土司僧格桑见朝廷发动大军来讨伐，向大金川土司索诺木求援。索诺木暗中发兵来助。乾隆帝为求对大、小金川各个击破，下诏给温福和桂林，命其先剿小金川，暂不声张大金川助逆为敌之罪。

温福和桂林先后到川，即分兵两路，温福率北路军自汶川（今四川汶川西南）西进，经会理（今四川理县）西越邛崃山，进攻小金川的北面，桂林率南路军自打箭炉（今四川康定）以东北进，经金汤城（康定东北），进攻小金川的南面。

乾隆三十七年（1772）春，清军开始对小金川实施前后夹击，沿途夺回僧格桑所侵占的邻近土司的土地，进军颇为顺利。五月，南路副将薛琮恃勇冒进，率三千多人深入小金川黑龙沟，遭敌截击，桂林未及时赴援，致使该部全军覆没。乾隆帝为此撤除桂林的职务，改以阿桂为参赞大臣，代桂林职。十一月，阿桂探知僧格桑拥兵美诺（今四川小金），率军乘夜以皮船渡过小金川，连夺险要，进抵美诺。僧格桑仓皇逃往其父泽旺所居的底木达，泽旺不肯接纳，迫不得已，僧格桑又投奔大金川。清军占领底木达，将泽旺缚献京师，并命索诺木交出僧格桑。索诺木置之不理。

次年春天，乾隆帝命温福为定边将军，阿桂为副将军，分道进讨大金川。温福因索诺木扼险为守，难以进军，暂时驻营于木果木（今小金川西北耿家关以西），命提督董天弼分屯底木达，以守备通往小金川的后路。温福秉性刚愎，独断专行，仍袭用张广泗强攻战堡的故伎，致使清军兵力分散，无所进展。小金川降众见清军久屯不进，群起反叛进攻清军，迫使董天弼拔营逃遁，并与大金川兵夹攻木果木清军大营，温福仓促迎战，被敌兵杀死，小金川又落入僧格桑手中。清将明亮、海兰察等闻警赴援，仅收容溃兵万余人。正在热河避暑的乾隆帝闻报大惊，命阿桂为定西将军，丰伸额、明亮为副将，调在热河专门训练进攻碉堡作战的健锐火器营两千人前去助剿，大大增强了进攻的力量。十月，再次收复小金川。

乾隆三十九年（1774）正月，乾隆帝以土司恃险反复，重劳用兵，非大举深入不可，乃命阿桂进攻大金川。阿桂兵分三路，奋力杀入，节节进攻，击破敌垒无数，大小数百战，直到七月，才至勒乌围附近。

勒乌围前面皆山，敌兵据险扼守，第一重山名博瓦山，第二重山名那穆山，最是险峻。阿桂命三路军绕攻博瓦山后，三路军仰攻博瓦山前。猛搏三昼夜，方杀上博瓦山，占领了第一重门户。休息两日，又开始进攻那穆山。这山势尤险，防守更严，阿桂仍令前后分攻，数日无效。海兰察作战非常勇猛，攻克不下，很是气闷，他遥望那穆山上，守兵布得密密层层，只是西边最高峰上，虽有两个大战碉，碉内却空若无人。于是黄昏一过，他带领六百名死士，历尽千辛万苦，在第二天黎明之前，爬上高峰，捣入碉中。每碉不过数十名敌兵，一阵狂扫，立即歼除。其他守山的敌兵，总以为绝壁峭立，没人可上，谁料上面竟插起了大清旗号，错疑是飞将军从天而降，顿时人心大乱，又被山下的清兵杀上山腰。第二重门户又破，勒乌围已无险可守。索诺木大为震惊，毒杀了僧格桑，将其尸体献给

清军，请求停止进攻。阿桂奉乾隆帝之诏，决心不再姑息，进攻益急。

这时已是秋末冬初，天气阴寒，雨雪霏霏。任凭阿桂奋力向前，也不能直捣敌穴。过了年，又到了春季，渐渐冰雪消融，路上方可行动。阿桂等转战而前，只一二十里地面，却攻了三四个月，才到达勒乌围。攻至八月，勒乌围终于被占领，然而索诺木与莎罗奔已逃往噶尔崖。阿桂等转包围困噶尔崖，断绝水道，以大炮昼夜轰击，仍不见效。直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二月，城中食尽，索诺木、莎罗奔等才被迫出降。阿桂献俘京师报捷，乾隆帝御驾午门受俘，因索诺木、莎罗奔罪大恶极，被凌迟处死。乾隆帝下诏改大金川为阿尔古厅，小金川为美诺厅，直隶四川省，令明亮为四川将军负责镇守。

清廷平定大小金川之战，前后共用兵五年，费帑亦至七千余万两，阵亡将士三万余人。这个代价虽然浩大，但对于促进西南少数民族与整个中华民族的统一还是大有意义的。

虎门之战

17、18世纪，西方国家先后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发展。为攫取更多的财富，英、法等国纷纷伸出魔爪大肆扩张。他们把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国视为一块大肥肉，蜂拥而至，企图用工业品敲开封建王朝的大门。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当时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他们的工业品根本无法渗入中国人的生活，相反，在贸易中，中国货却畅销西方各国，这让西方资产阶级既慕又恨。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逆差，追逐高额利润，从18世纪末开始，他们丧心病狂地把鸦片输入了中国。

鸦片是用罂粟果实中乳状汁液制成的毒品，里面含有大量能麻醉人的毒素。吸食者骨瘦如柴，精神萎靡，最后凄惨死去。英、法等国贩来的鸦片，在很短时间内就毒害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据粗略统计，仅1838年，全国吸食鸦片的人就超过了二百万，而且遍及社会各阶层，上至朝中权贵，下至贩夫走卒，甚至还有缉毒缉私人员。鸦片的泛滥，严重地摧残着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加剧了清王朝的腐败，给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华民族造成了深刻的民族危机。

面对烟毒造成的民族危机、社会危机和财政危机，具有强烈爱国主义

思想的林则徐力排众议，以“（对烟毒）若犹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充饷之银”的疾呼震动了犹豫不决的道光帝。他临危受命，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慨然前往遭受烟害最重的广东禁烟。

在广东人民的全力支持和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及水师提督关天培的大力协助下，林则徐沉重地打击了外国鸦片贩子的嚣张气焰，粉碎了他们的种种阴谋，一举收缴鸦片二百三十七万多斤。清道光十九年（1839）6月3日至25日，这些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在虎门海滩被全部销毁，前后二十三天。前来观看的各界人士络绎不绝，群情激愤，就连林则徐特邀来观看的外国商人和传教士，也不得不“摘帽敛手”以示钦佩。中国人民的禁烟斗争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鸦片贩子哪会就此甘心，他们疯狂叫嚣着要报复。9月4日，处心积虑的英国人在九龙山口岸以索食为名靠近中国水师战船，发动突然袭击，燃起了鸦片战争的战火。

在这场战斗中，中国士兵在参将赖恩爵的指挥下对入侵之敌给予坚决回击，先后击毙十七名英军，打断敌兵船“甘米力治”号船长忌刺士的胳膊，于下午6点击退了狂妄的侵略者。此战不仅打击了英军的嚣张气焰，也沉重打击了他们的士气。后来，当时参战的英军士兵艾姆斯里回忆说：“我真希望我绝对不再参加战斗，这回，我们已经被揍得很够受了。”

11月3日，英舰“窝拉疑”号和“海阿新”号又开到虎门以外的穿鼻洋面，企图拦截遵照林则徐“永不夹带鸦片”规定、从事正当贸易的商船报关入口。关天培闻讯赶往查看。正当他准备与英舰交涉时，“窝拉疑”号船长士密悍然下令开炮。顿时，中国水师战船周围巨浪滔天，炮弹横飞。英国人望着烟火弥漫的中国战船，得意地大笑起来。

可惜他们高兴得太早了，措手不及的中国水师在关天培的带领下，迅速组织了有效的还击。硝烟中，关天培不顾头、手受伤，血流不止，持刀屹立船头，大喊：“有击中敌船者，重赏！”话音未落，只听敌船“窝拉疑”号船头一声巨响，随后腾起一团黑烟，船头之人纷纷滚落海中。

“好！打得好！”关天培用刀指着敌舰高声称赞道。随后，炮手麦廷章指挥士兵又连续两炮击中该船，打穿舰身左右舱口，摧毁了后楼。

英国人万万没想到中国水师会有如此强的战斗力，偷鸡不成反倒蚀了一把米，看着“窝拉疑”号浓烟滚滚，帆斜旗落，而“海阿新”号也好不了多少，再也无心恋战，慌忙开足马力，灰溜溜地往外洋逃去。第一次穿

鼻之战以装备处于劣势的中国军队取胜而告结束。

紧接着，停泊于九龙尖沙咀的英舰不甘心失败，又连续六次向官涌炮台发动进攻。林则徐早料到英军会打官涌的主意，命令尖沙咀和官涌的清军“固垒深沟”，严阵以待。英军的六次进攻无一例外以惨败告终。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侵略者占据尖沙咀洋面作巢穴的美梦宣告破灭。他们不得不放弃原定计划，远遁外洋。

第一次穿鼻之战和官涌之战的胜利，大大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斗志，也说明当时英国侵略者的坚船利炮也并非是不可战胜的。同时，林则徐和邓廷桢、关天培等人清醒地认识到，要打败装备精良的侵略者，还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

根据当时中国水师战船的作战能力和装备状况远不如英舰的事实，林则徐制定了“以守为战，以逸待劳”的策略，并在此原则下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准备。

首先，充实了广东水师的力量，提高战斗力，加固了禁烟时布设的木排、铁链，保证实战时能守得住，并在可能经常发生战斗的战略要地——尖沙咀、官涌添建炮台。林则徐认为，英国侵略者赖以为恃的就是船坚炮利，因此他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购来了两百多具西洋大炮，甚至还购买了曾参加过“九龙之战”的英国旧商船“甘米力治”号，把它改造成了艘战舰。同时他命令关天培等加紧训练水师，招募船户壮士五千余人作为预备队。此外，他还“日日使人刺探夷事，翻译夷书，又购其新闻纸”，以做到知己知彼。

事实证明，面对强敌，林则徐的应敌之策是完全正确的。英国侵略者见虎门附近的大小炮台都有重兵把守，虽有侵略之心，却无来犯之胆。他们在虎门外海面盘桓了十几天，始终无机可乘，不得不离开广东海面，向北窜入浙江境内。

一方面是侵略军增加力量，北上骚扰东南沿海，另一方面却是闽浙一带准备不足，甚至毫无防备。因此，英国侵略者得以乘虚长驱而入，袭取定海。这时，优柔寡断的道光皇帝动摇了。他相信投降派琦善和伊里布等满洲贵族的话，决意妥协。对御敌有功的林则徐不仅不提拔奖赏予以重用，反而无端斥责是他把英军逼到闽浙，最后干脆把他给撤职查办了。由此，战局急转而下。

接替林则徐主持广东大局的琦善是个满脑子“妥协议和”念头的投降

派。他竟然任用被林则徐缉拿在逃的汉奸鲍鹏与英国人“周旋避战”，对侵略者的话言听计从。他不仅不巩固海防，反而“一切力反前任所为”，对林则徐在任时的战守设施大加裁撤，遣散了林则徐募集的数千壮丁水勇。有人向他报告缉拿汉奸、鸦片的情况和英国军队最新动态时，他也大加训斥，反诬说汇报者是汉奸。

正当琦善、鲍鹏等人进行投降卖国活动的时候，英国侵略者却在积极准备军事进攻。1841年1月7日，英军在虎门外发出登陆信号。由于琦善裁撤了珠江口周围的大量军事设施，又拒不发兵增援，英军花了不到一个半小时，就轻易攻占了虎门的门户沙角、大角炮台。1月25日，英国侵略军的铁蹄踏上了香港的土地。

沙角和大角炮台一失守，整个虎门防御体系立时陷入瘫痪状态。在琦善兵力不固，民情不坚，若与交锋，定无把握，决意妥协求降的指导方针下，守军根本无法进行认真的备战。当时，关天培驻守靖远炮台，李廷钰守威远炮台，马辰和多隆武守定远炮台，手下都只有几百人而已，弹药也严重不足。面对整日游弋在虎门外海的英舰，守军们无不感到心急如焚。无奈之下，李廷钰跑到琦善面前痛陈虎门形势，谁料琦善死活不答应增兵，还大发脾气说：“就是因为你们整天只知打打杀杀，惹恼了洋人，议和才屡屡受挫！”李廷钰急了，“噗通”一声跪倒在地，号啕大哭，乞求发兵增援。琦善见状，面色一变，犹豫片刻，终于开口了：“添兵二百！多一个也不行！”

虎门前线的指挥者连求援增兵的请求都得不到允准，又怎么能根据敌情进行适当的战斗部署！原本坚不可摧的虎门要塞就这样在琦善的盲目指挥下形同虚设。

2月23日，英舰“复仇神”号冲进三门口，把钉在海中的木桩轻易拔去，破坏了拦海栅栏，以扫清虎门前沿阵地。25日，十八艘英舰包围横档、永安两炮台，并在虎门防线最薄弱的环节下横档强行登陆，修建了巩固的炮兵阵地。26日清晨，英军炮轰清军炮台所在的上横档。不到两个小时，上横档失守。下午4点，虎门要塞陷落。

在虎门之战中，由于胆小的琦善懦弱无能，严重影响了清军的士气，当英军利用涨潮时机由横档西边浅水道包抄进攻时，清军中许多人掉头就跑。有些炮台甚至未放一炮便落入敌手。真正同侵略者作殊死战斗的，只有关天培部。

战斗开始前，关天培自知敌强我弱，又孤立无援，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将一个装有自己几缕头发和几枚牙齿的木匣交给家人带走，说：“我已决心以死报国，若是战后找不到我的尸体，就把它葬了！”

激战中，他不顾随从劝阻，亲自操炮瞄准射击。但是由于弹药制造商偷工减料，炮弹中火药分量严重不足，有的甚至全是沙土，中方的火力根本无法达到阻击敌人之目的。滚滚硝烟中，关天培圆睁虎目，满身是血，仍然沉着地瞄准射击。一些官兵在他的带动下，也奋不顾身地投入战斗。突然“轰”的一声，关天培身边的一门大炮发生膛炸，周围士兵死的死、伤的伤，幸存的也个个面无人色。关天培当即被震倒在地，一个随从见状，扑上来抱住他，大喊：“事不宜迟，快走吧！”说着背起他就准备往后撤。关天培擦擦脸上的血，拔出佩刀作势要砍背他的随从，叫道：“谁敢后退，我就砍了谁！”随从无法，只好松开手。关天培一挥佩刀，高喊一声：“好汉子，跟我杀敌！”转身又投入了战斗。

这时，英军已攻入炮台，关天培大喝一声，带领数人冲入敌阵。只见刀光闪闪，血花飞溅，英军被砍得七零八落。然而终究寡不敌众，关天培和他的战士们在力劈数十个英军后，重重地倒在了血泊之中。一代名将就这样血染沙场，为国捐躯了。

关天培与守台将士四百余人壮烈战死，虎门之战的失败，一时震惊全国。这本是琦善投降卖国政策所导致的后果，并非英军不可战胜，然而腐败的清朝统治者却心惊胆战，丧失了抵抗侵略的信心和决心，一心只想妥协求和，丝毫不理会广大人民和爱国将士要求抵抗的呼声。此后，英军趁胜闯入珠江，27日攻下乌涌，又乘潮占领了距广州仅二十里的猎得、二沙尾。广州的门户洞开，战争的主动权完全被英国侵略者所掌握，中国进一步坠入了这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深渊。

三元里之战

英军攻占虎门之后，溯流而上，沿途的防守要塞在琦善的卖国投降政策下丢失殆尽。英军遂长驱直入，于1841年（清道光二十一年）5月24日直逼广州城下。

守卫广州外围的清军不战而退，纷纷撤至城内，又使英军从容占据了广州城外的几处重要炮台。英军以其中的四方炮台为据点，公然在城外高